

羅賓斯坦著

潘光祖譯

蘇聯對外政策卅年

(1917-1947)

時代社

羅賓斯坦著
潘光祖譯

蘇聯對外政策卅年

(1917—1947)

時代社出版

羅賓斯坦著

潘光祖譯

蘇聯對外政策卅年

(1917-1947)

時代社

目 次

蘇聯對外政策的民主基礎·····	(5)
------------------	-------

I. 列 明著 何 歌譯

蘇聯對外政策卅年·····	(17)
---------------	------

N. 羅賓斯坦著 潘光祖譯

(一) 蘇聯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	(17)
----------------------	------

(二) 蘇聯對外政策的徹底性和真誠性··	(30)
----------------------	------

(三) 爲各民族平等和獨立而鬥爭·····	(39)
-----------------------	------

Н. Рубинштейн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СОВЕТ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Перевод Пан Гуан-цзу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2-ое издание

蘇聯對外政策卅年

著作者 Н羅賓斯坦 翻譯者 潘光祖
發行者 姜椿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〇一

ЕРОСНПУВСО



(1947, 11: 2000冊)

(1949, 12. 3000冊)

北京分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五)一六六〇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二六九號

電話：一四〇二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南京分店：南京中山路三三六一八號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蘇聯對外政策的民主基礎

1. 列 明 著

何 歌 譯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國際關係方面開闢了一個新時代。

在這以前，全世界都被帝國主義控制着。而什麼是對外政策方面的帝國主義呢？這就是反動勢力和民族壓迫的加強，瘋狂地併吞別人的土地和殖民地，大多數弱小國家的服從極少數強國，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發展不平衡性的尖銳化，以及爲重分世界而引起的世界大戰。

自從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勝利之後，與侵略的、併吞的、反動的帝國主義對外政策對立地出現了正義的、進步的、愛好和平的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蘇聯的對外政策，從它第一步起就走向着這樣的目標：使全世界人民免除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和蹂躪，援助

國際舞台上的進步民主力量，放棄祕密外交，廢除強暴的、奴役的不平等條約。

蘇維埃對外政策的基礎就是要求和平的意圖。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翌日，蘇維埃政府就頒佈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戰國家提出了民主而公正的和平建議。和平政策——這對於蘇維埃國家並不是一種偶然的、暫時的現象。它與蘇維埃社會制度有機地關聯着，正如掠奪、侵略和戰爭的政策之與帝國主義國家分不開一樣。

蘇維埃國家代表着人民大眾的利益，而人民不要戰爭——他們要和平。蘇維埃國家關心的，是國內生產力的積極發展，人民幸福的不斷增高。如所周知，資本國主義家的工業化通常總是與侵略戰爭，掠奪鄰國，索取賠償（例如德國）或擄取殖民地（例如英國）相關聯的。蘇維埃國家發現了自己的特別的工業化道路，不需要向外擴張的道路。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可能性，蘇聯在不到二十年的短短時期中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變成了最進步的農業地區。和平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前提。

現在，蘇聯人民向自己提出了巨大的令人興奮的目標——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和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很明顯地，這首先需要和平。所以，戰後時期，蘇聯

繼續徹底執行自己的正義的、和平的對外政策，是很自然的。『蘇聯的和平政策並不是一種暫時的現象，』莫洛托夫外長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對選舉人演說道，『它是根據我國人民的基本利益和現實的需要，根據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質幸福，根據蘇維埃人在建設新生活時的巨大要求而決定的。蘇聯人民深信，蘇聯將順利解決這一切任務，如果侵略者的雙手被縛住的話。』

蘇聯的對外政策是建基於平等和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上的，它是建基於尊重一切大小國家和民族的權利與獨立原則上的。在帝國主義環境中，民族和殖民地的壓迫，大小民族的主權和權利的輕視，是國際關係的常規。蘇維埃國家一開始就放棄了沙皇所強加於東方諸落後國家——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那些不平等條約。蘇維埃對外政策的這些崇高原則，具體表現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列寧和史大林致俄國及東方的回教徒勞動者的文告中，及其他對外政策的文件中，特別是後來與中國，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所簽訂的條約中。

蘇聯自始至終堅持着民族自決權並且努力保護着民族權利，使它們免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破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保護弱小民族的權利的問題是

與愛好和平各國建立統一戰綫的問題以及警告日益逼近的戰火的問題密切有關的。

歷史不會忘記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領袖們在日益兇猛的法西斯侵略火焰面前的可恥、胆怯和可惡的行爲；歷史不會忘記，這些領袖們怎樣背叛和出賣了阿比西尼亞，中國，西班牙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民族的利益；他們怎樣把全世界的利益做買賣；他們怎樣點燃反蘇戰爭，他們怎樣用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協定打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閘門。

歷史也不會忘記蘇聯對外政策的崇高可敬的舉動：它曾號召設立集體安全制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它曾英勇保衛中國，阿比西尼亞，西班牙等遭受法西斯侵略各國的利益，它忠於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國際義務，它建立了愛好和平國家的統一戰綫。

在戰後時期的環境中，蘇聯繼續守護着愛好和平各國合作的原則，一切愛好和平民族的自決原則。蘇聯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與種族的歧視。它擁護殖民地民族的完全獨立而不是虛有其名的獨立。

蘇聯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也不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強加於別人。列寧和史大林堅決反對『推銷革命』和『輸出革命』的理論。選擇適當的政治和經濟的制度——這是各民族本身的事。同時，蘇聯努力保

護弱小民族，使它們脫離外國反動集團的干涉。希臘的情形已足夠證明，這種干涉將引致怎樣的後果——它引致了內戰的爆發，法西斯的猖獗，造成了戰後世界中的混亂與不安的發源地。現代『新復辟主義』的概念，即支持爲人民所仇視的或已被人民推翻的反動舊政權的概念——決不能作爲持久和平政策的基礎。

蘇聯的對外政策是唯一根據科學基礎，根據正確和精密理解社會發展法則的政策。

這使蘇聯的外交不但能正確分析當前的形勢，並且能預計到事變的發展過程。列寧和史大林在科學地解決國際關係問題和蘇聯對外政策問題方面，作了非凡的榜樣。我們可以引述許多歷史節例，來證明列寧—史大林的科學預見的力量：如列寧評論凡爾賽組織爲腐敗的、不穩固的和軟弱的組織；史大林在一九二七年預言資本主義的穩定必然崩潰和危機必然到來，以及資產階級將在戰爭中尋找出路等。還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最初打擊時，史大林在一九三〇年六月聯共（布）第十六次黨大會報告中就預言，反動集團將在國內法西斯化，在國外戰爭和侵略方法中尋找出路以逃避危機。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聯共（布）第十七次黨大會中史大林說得更確定：『局勢正日益走向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在同一報告中，史大林具體暴露了那自

的高等種族的德帝國主義的各種戰爭計劃時，提醒了古羅馬的命運，後者曾把其他民族看做野蠻人，而結果被反對她的各民族聯合起來所打倒了：『那末，我們要問，今天的高等民族的要求，怎能保證不會引致同樣的悲慘結果呢？』——蘇維埃國家的領導者當時說道。讓那些現在也自稱為『高等種族』的世界霸權的覬覦者，回想一下這已經應驗的預言吧！

蘇聯的對外政策是公開的，誠實的，有原則的和澈底的政策……它反映着蘇聯人民和一切愛好和平民族的利益。公佈沙皇政權所簽訂的祕密的帝國主義條約，是蘇維埃外交的最初行動之一。蘇維埃國家沒有什麼要隱瞞世界輿論，因為她追求着正當的崇高的目標。蘇聯的外交是言行一致的。對國際義務的尊重，對諾言的忠實——這就是蘇聯對外政策的主要特徵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和戰時，愛好自由的各民族都已相信蘇聯是一股強大的力量，而這股力量是保衛愛好自由各民族的權利，保障世界和平與安全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是反法西斯聯盟的決定性的戰鬥力量。蘇聯一對一地與希特勒德國及其附庸苦鬥了三年，德國武裝力量和作戰力的五分之四都用來對付蘇聯。甚至在歐洲戰場開闢以後，德國武裝力量和作戰力的三分之二還是集中在東綫，以對付

蘇聯。爲了反法西斯聯盟的利益和加速勝利的到來，蘇聯竭力爭取開闢第二戰綫，使英蘇美聯盟的全部資源都動員起來。然而，如所周知，英美統治集團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却是不同的。第二戰綫直到一九四四年夏季，即當希特勒德國的命運已經決定，當紅軍已能够獨力佔領整個德國和解放法國的時候，方才開闢。

蘇聯是反法西斯聯盟的政治領導力量。蘇聯的參戰加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性和解放性。與蘇德戰綫上所展開的大規模戰鬥比起來，以前的事件祇是些小小的插曲。在一切愛好和平民族的眼前，蘇聯的鬥爭是戰爭的反法西斯解放性的具體表現，是它的正義目的的保證。

蘇聯是爲完全的、澈底的戰勝敵人而鬥爭的，因此她給了一切反動的、慕尼黑的、半法西斯的集團以打擊，後者曾企圖與法西斯侵略者勾結，爲他們爭取妥協的和平。蘇聯堅決擁護法西斯侵略首腦的無條件投降的口號

蘇聯光榮地，作爲歐洲和世界文明的拯救者，走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國際反動黑暗勢力企圖歪曲和污蔑蘇維埃對外政策的真實的崇高的目標。反蘇毀謗者製造了所謂『鐵幕』，所謂『莫斯科斯芬克斯』和所謂蘇聯的『不光

明的』，『祕密的』意圖等神話。他們根據『毀謗，毀謗，想盡方法毀謗！』的原則而行動。但是這種毀謗已經有長久的歷史了。我們在二十年代，在三十年代以及在戰爭時期也聽到過關於蘇維埃政策的『祕密性』的罵聲。事實證明，蘇聯祇爭取了一件東西：和平與安全。而現在她還在爭取持久的和平與安全。

蘇聯是以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可以並存和必需合作的事實為出發的。與建立思想觀念集團的政策相反，蘇聯提出了國際合作的政策。蘇聯認為，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別並不是國際間經濟，政治和文化合作的不可克服的障礙。史大林在最近一個時期中，曾數次提到這個現代國際政策的決定性問題。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與史達森談話時，史大林指出，蘇聯的經驗證實了合作的可能性，而這種合作也可以在和平時期繼續下去。史大林指出，這種合作應該建基於尊重人民所選擇的制度，歷史將顯示出，那一種制度更好。

資產階級的政論家企圖把史大林的話解釋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先前原則的修正。但是史大林與史達森談話時，並非偶然地引證列寧的話，後者最先提出了兩種制度合作的思想。在一九一九年九月致美國工人的信中，列寧曾說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將並肩

生存的』時期，並且認為兩種制度的最廣泛的經濟合作是有希望的。在一九二七年聯共（布）第十五次黨大會上，史大林指出道，『我們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的基礎，就在於兩種對立制度可以並存。』

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合作原則，在反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鬥爭時期，順利地實現了。這種合作並不局限於軍事方面。如所周知，蘇聯即在和平時期也可以成爲一個有希望的，優良的主顧，特別是因爲蘇維埃經濟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情勢是無關的。所以，和平時期的發展國際合作是具有一切可能性的。思想意識的不同並不妨礙這種合作。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回答威斯的問題時，史大林指出，隨着蘇聯的日益走向共產主義，『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但不會減少，而且可能增加。』

現實而合理的國際合作綱領，獲得了全世界一切國家的進步民主集團的支持，以及願意發展對蘇商業關係的清醒的資本主義集團的支持。

在聯合國機構中，蘇聯努力保護着平等合作的公正原則。最近，却有人企圖動搖，甚至破壞新國際安全機構所賴以建立的基礎。特別是大國一致的原則，即所謂『否決權』，遭受了某些帝國主義集團的殘酷攻擊。然而，這個原則却是大國必需一致和協議的具

體表現，它可以確保國際安全機構的效力，促進不同的社會制度在這機構中的合作，並且可以豫防它變成某一強國的工具。

蘇聯領導進行消滅和禁止原子武器的鬥爭，領導進行嚴格裁軍，停止那毫無理由的佔領別國基地與土地的鬥爭，以對抗帝國主義的擴軍和以戰爭作威脅的『原子外交』。

以自己的心思來忖量別人的新戰爭宣傳家們，企圖把蘇聯的這種公正政策曲解為投機思想或蘇聯的狹義民族主義動機。這是多麼陳舊的，令人厭惡的解釋！它們早在國聯的時代就出現過了，當時蘇聯提出的裁軍計劃，遭到了普遍的反對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怠工。蘇聯的禁止原子彈和裁減軍備的建議是符合全世界千百萬人的希望的。它們獲得國際的熱烈響應，絕不是偶然的。

蘇聯在戰後時期徹底堅持着建立持久的、民主的和平事業，祇有這種和平才能保證防止新侵略的抬頭。蘇維埃外交在與前德國附庸們締結和約時，堅持了這些原則。如所周知，某些強國會企圖利用和平條約作為政治和經濟壓迫東歐各國的武器，以便鼓勵新民主國家中的反動勢力，替舊政權的復甦掃清道路。這個攻勢被蘇聯和新民主國家的共同力量所擊退了。

蘇聯在解決德國問題時，堅持德國民主化，實現賠償計劃，擴大德國工業的和平生產的可能性，協助國內的真正民主力量，消滅獨佔組織以及實行土地改革等原則。蘇聯認為，德國統一的問題必須由德國人民自己來決定，因為強迫的聯邦化或分解德國，將把一個强有力的政治武器——德國統一鬥爭的領導權——交給德國報復主義者的手中。

蘇聯主張，對日和約的締結，以及一切與日本有關問題的解決，也在各有關盟國的平等合作的基礎上進行，以有利於民主和平與安全為原則。

國際反動派感覺到自己腳下的基礎在動搖，他們激怒了。新戰爭的煽動家展開了瘋狂的活動。因此，一切和平的友人必需提高警覺性。因此，我們必需一分鐘也不疏忽帝國主義的詭計。和平的友人們現在是擁有許多有利條件的。

一切國家裏的『普通人』都不要戰爭，而資產階級的統治集團也不得不或多或少地顧忌到他們。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廿六日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關於廢除死刑的命令中說道：『雖然侵略份子還企圖煽起戰爭，但和平的事業可以認為已經有了一個長時期的保證。』

蘇聯——這個國際舞台上最強大的進步力量——的對外政策就是這樣的。蘇聯在國際關係方面堅守着